

伯恩斯坦语码理论的社会符号学研究

胡安奇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巴兹尔·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植根于语码这一核心概念, 试图在语言相对主义视野下探究社会分工、权力与控制、教育话语和文化传播等社会学课题, 从语言使用切入教育话语, 构建自己的结构主义社会学。语码具备语言学和社会学双重属性。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来看, 语码发挥着符号中介的功能, 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 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关系对言语行为的规制力, 另一方面在教育话语体系中通过对教育知识的分类和架构, 实现社会关系的控制和调节功能。

关键词: 伯恩斯坦; 语码; 社会符号学; 符号中介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18) 5-0084-10

一、引言

巴兹尔·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 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在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教育话语理论等方面建树卓越, 其主要成果收录于四卷本论文集《阶级、语码与控制》和《教育、符号控制与身份: 理论、研究、批评》一书。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植根于语码 (code) 这一核心概念, 试图在语言相对主义视野下探究社会分工、权力与控制、教育话语、文化传播等社会学课题, 从语言研究切入社会问题, 逐步回归涂尔干 (Durkheim) 的功能主义传统并最终走上欧洲结构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Atkinson, 1985: 136)。语码孕育于早期社会学调查活动, 成形于六七十年代的语言研究, 而后在教育话语研究中被系统提出, 可以说贯穿于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的全过程, 因而具备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韩礼德

收稿日期: 2018-03-1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社会-认知视域下的伯恩斯坦话语理论研究”(GD17XWW09)

作者简介: 胡安奇,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

(Halliday, 1975/2007: 153) 曾明确指出, 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既是一种语言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故而, 对于语码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或者社会学的单一视角出发, 而应该从语言-社会的二重维度审视语言在社会系统中的运作机制。就此而言, 把语言使用者和社会结构系统均纳入符号意义的赋予和识解的社会符号学无疑为语码的阐释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框架。本文正是在社会符号学 (Halliday, 1978/2001; Hodge & Kress, 1979/1993, 1988; van Leeuwen, 2005; 田海龙, 2015) 的理论视角下梳理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中语码的概念演进和内部逻辑, 探讨它的社会符号特征, 并对它在整个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中的地位和理论价值作尝试性解读。

二、从符号二元论到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的解释力来自于言语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 它发端于索绪尔 (Saussure) 的符号二元论和语言社会观, 经由叶尔姆斯列夫 (Hjelmslev) 的语符学 (Glosssematics) 以及奥格登和理查德 (Ogden & Richards) 的“意义三角”理论, 把符号的指称意义和情感意义以及符号的生产、接受及其符号-语境 (sign-situation) 纳入符号的意义圈, 符号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社会团体的集体意识, 它还突出了符号使用者的主体地位, 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增益和亏损同样也纳入符号的意义循环之中, 意义的研究从符号的内部运作走向意义的功能性和社会性。然而, 奥格登和理查兹对语言语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交际的情景语境, 而没有涉及到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语境; 尽管注意到了语言的多功能性, 但是他们对语言功能的划分过分依赖情景语境的作用, 不仅繁杂且不全面; 另外, 他们对语言的语境以及它与语言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没有作系统、深入的讨论。韩礼德 (Halliday, 1978/2001) 辩证吸收了巴赫金 (Bakhtin) 的符号意识形态性以及言语体裁的概念 (胡壮麟, 1994) 和伯恩斯坦的语言社会学思想, 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意义理论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来阐释语言在社会中的运行机制, 以考察语言的生产、传播、接受、交换等过程, 强调从社会维度解释语言的变异和变革。韩礼德认为, 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抽象、孤立的符号, 而是符号系统, 是对意义的研究。他 (Halliday, 1978/2001: 108) 提出了社会意义理论的六个成分: 语篇、语境、语篇变体或者语域、语码 (伯恩斯坦意义上的语码)、语言系统 (包含语义系统) 和社会结构, 并把社会结构看作是构成“文化现实”的一个意义系统, 经由文化语境、家庭关系系统、社会等级系统介入语言交际之中, 从而影响着意义的生产与传递过程。通过这六个成分, 语言意义的生产就不仅仅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倡导的封闭的、自治的过程, 相反, 意义从符号体内部和符号的组合关系扩展至小句及语篇并延伸至社会系统, 符号具备了意识形态性。依据巴赫金/沃罗希洛夫 (Bakhtin/Volosinov) 的符号观, 符号和意识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符号所到之处, 都有意识形态的身影, 反之,

任何意识形态的事物都具有符号价值” (Volosinov, 1986: 9-10)。即是说, 言语符号作为交际的媒介, 产生于被社会建构的个体之间 (而非自然人), 因而被意识形态化, 从而使得韩礼德的语言思想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 二者都“坚持把话语作为真实的语言-言语 (language-speech) 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 (Volosinov, 1986: 97; 胡安奇、曾蕾, 2014)。由此可见, 韩礼德 (Halliday, 2003: 2) 的社会符号学对言语意义的解读是多维度的: “意义系统是一个四维复合体, 它包含意义性、社会性、生物性、物理性: 意义在社会中建构, 经由生物学方式激活, 通过物理途径而被交换。”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韩礼德的社会意义学并没有构建一个概念化的符号体系, 这一任务是由霍奇和克雷斯来完成的, 他们 (Hodge & Kress, 1979/1993, 1988) 依据巴赫金的话语的意识形态论和对话理论、本维尼斯特 (Benveniste, 1966/1971) 的主体间性思想和韩礼德的社会意义学等思想, 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社会符号化的建构, 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符号学模型。

霍奇和克雷斯的社会符号学的出发点是承认个体意识 (consciousness) 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性。但是, 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意义在特定社会阶层或者群体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功能、取向和内涵, 那么, 控制着不同阶层对社会意义的差异取向的控制机制被称为话语控制系统^① (logonomic system), 它是一套社会符号行为控制原则, 对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的条件和过程起到限定作用。另外, 话语控制系统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复合体的一部分, 它要么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权威和要么代表着被统治阶层的抗争, 因而实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 反映的是社会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的权势关系 (power) 和联结 (solidarity) 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伯恩斯坦的语码也属于话语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它们都是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规制原则。对于社会符号学研究来说, 符号的这种社会意指功能属于符号的符指层 (semiotic plane), 也即语言作为社会过程在社会中的建构和交换, 显然, 符号的符指层所指涉的是意义的社会生成系统。另一方面, 符号的所指意义在社会符号学中属于它的模因层 (mimetic plane), 指涉符号系统的外部世界。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 人们较多关注符指层, 也即符号意义的社会功能, 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 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元符号 (meta-sign) 来表达, 比如, 口音、词汇、句法、语体风格、文化等来实现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和同一性, 也即话语的权势和联结功能。简而言之, 社会符号学坚持以意义的社会性为基础, 突显的是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和社会建构性。

三、作为社会符号的语码

依据社会符号学的基本观点, 语言是社会符号系统的一部分, 言语行为属于社会过程, 语言的意义不仅产生于“形而上”的内部规则系统, 它还具有一个“形而下”的“器”——社会阶层关系 (class relation), 因为社会劳动分工下的阶层分化

必然导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系统，而语言则成为权力的生产与再制系统中最为有效的符号形态（Bourdieu, 1991: 164）。伯恩斯坦毕生致力于探索知识、话语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差异呈现和使用，从而塑造和建构不同的知识结构并维系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语码的概念贯穿于他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教育话语理论的始终。通过语码的社会符号化，伯恩斯坦把话语、意义、语境、社会阶层、家庭角色、教育控制、社会变革、文化传递这些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基本思想有机联系起来，并最终把它们归结为“社会关系”系统网络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体系。从社会符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符指层”，也即语码的语义系统，还是在“模因层”，也即语码所指涉的社会关系维度，语码均被赋予社会符号意义，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化功能。

1 语码作为规制原则

历时的来看，语码的概念和涵义呈现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起初，伯恩斯坦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使用模式区分出两种语言变体：公共语言（public language）和正式语言（formal language），前者为工人阶级儿童所熟悉，后者经常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二者的区别主要在词汇和语法表层。为了挖掘不同语言使用模式背后的社会根源，伯恩斯坦使用语码这个概念探索语言的编码取向、言语变体跟语境及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而把前者抽象为局限码（restricted code），后者为曲阐码（elaborated code），语码进而被看作“是在不同社会语境下控制话语实现的规制性原则”（Bernstein, 1971/2003: 9）。但是伯恩斯坦注意到，工人家庭的孩子尽管比较熟悉局限码，他们完全可能在特定语境下使用语法结构复杂的曲阐式语言变体，那么，语码跟特定情景下的言语变体关系如何，二者如何区别？伯恩斯坦在语言学家韩礼德和哈桑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首先，哈桑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研究把传统的意义研究从小句内部提升到语篇层面，意义从词汇、小句走向小句复合体及语篇本身，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下文语境和语言的使用环境，语言的意义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就克服了伯恩斯坦早先试图仅通过对特定言语使用的微观描写推导出语言变体的宏观特征的研究困境和误区。对此，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2003: 10）毫不掩饰他对哈桑的感激之情：“实际上，如果我早点意识到她（哈桑）早期著作的社会学意义，我也不会作出一些让我们的研究陷入死胡同的决定了（而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责任）。”语境思想的引入对后期语码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此，伯恩斯坦划分出两种意义序列：语境依附型意义（context dependent meaning）和语境独立型意义（context independent meaning），前者具有个别性，后者具有普遍性。对于个别性的语境依附型意义，语码的规制原则相对隐晦，而对于普遍性的语境独立型意义，语码的规制原则较为明确。其次，伯恩斯坦借鉴韩礼德

有关语言功能的研究成果，把语码跟语码变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挖掘出来。韩礼德认为，儿童使用语言实现七大功能：工具功能、控制功能、个体功能、互动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能，伯恩斯坦则根据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基本社会化情景把它概括为四大功能：控制功能、教导功能、人际功能和想象功能。语码在具体语境中体现为不同的言语变体，实现的是语义功能，语码的涵义同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结合在了一起，成为“控制四大基本社会化情景中的语言实现形式的规制性原则”（Bernstein, 1971/2003: 11），它在语言表层句法实现形式的规制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限制性（restriction）和阐释性（elaboration），前者通过限制性的语码变体实现，后者通过曲阐释性的语码变体来表达，语码是潜在于语言变体背后的制约性规则，相当于语言的深层结构，位于语言的语义层。

那么，语码的规制力何来？伯恩斯坦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家庭和学校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都对话语的实现形式产生重要影响，个体通过社会交际过程塑造社会角色，因而，在伯恩斯坦看来，角色（role）是一个复杂的编码过程，它不仅控制着意义的创造和组织方式，还制约着意义的传递和接受。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言语的词汇和句法的选择，因此，语码或者语言形式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映射。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2003: 104）用下图来阐述社会关系、语码和语言实现之间的交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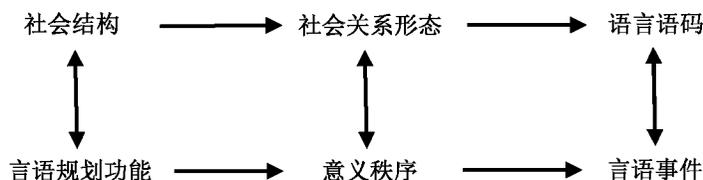


图1 语码、语言形式、社会结构关系

如图所示，社会结构在言语活动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它通过社会关系形态决定着语码的语言形式，同时它还在心理层面制约着交际的走向，进而创造出不同的意义秩序，并通过不同的言语事件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伯恩斯坦对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虽然受到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萨丕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等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但是他绝不是一位语言决定论者，相反，对于他来说，社会关系决定着语言的使用，社会关系模式或者说社会结构形成不同的语言形态，也即语码；反过来，这些语码“本质上传递文化并且制约人的行为”（Bernstein, 1971/2003: 96；丁建新，2016）。语码对言语行为的规制力的根源就在于社会阶级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对于此，伯恩斯坦（转引自 Hasan, 2009: 143）直言不讳：“毫无疑问，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对社会化过程具有决定影响力的是社会阶级。”至此，伯恩斯坦

的语言学社会学中的语码初具雏形，作为语言语码，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对不同社会阶层所呈现出的语言模式的差异具备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般解释力，但是它还不具备符号的内部结构形态和意义生成机制。同时，社会关系的规制力绝不只限于一般言语活动之中，它存在于语言社会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伯恩斯坦创造性地把社会学研究中的家庭结构、社会控制与人类学研究中的交际过程、符号结构跟语言语码结合起来，语码的规制力通过语言结构转化为选择（selection）和整合（integration）功能，在特定的语境下体现权力和社会关系，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等形式，塑造心理结构并传递文化，这就为语言语码到教育语码的过渡作好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赋予语码这个抽象概念一个具体的符号结构和成分关系奠定了语言学、社会学和符号学基础。

2 语码作为符号控制

伯恩斯坦借鉴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尤其是他的社会团结理论，把教育作为“社会事实”和独立的系统，从制度性和结构性方面对教育话语和教育传递作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推导出教育话语的规制原则（也即语码）的内部结构。可以说，分类和架构构成了伯恩斯坦教育语码理论和教育话语理论的核心，同时也为语码的符号化提供可能。简而言之，分类指的是社会分工下的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分类的强弱反映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层关系；架构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对交际规则的控制。就学校教育来说，分类和架构是用来区分不同教学内容之间的隔离（insulation）和边界（boundary）的程度。相应地，分类就是“内容之间的边界维持程度”，它不指代具体的教学内容，而是内容之间的关系和内容之间的差异程度（Bernstein, 1975/2003: 80）。分类可以理解为对教育知识分工的程度，反映教育信息系统中大纲的基本结构。架构用来描述教师和教授内容之间的特定教学关系，体现的是“教师和学生对教授和习得的知识的选择、组织、进度以及时间的控制程度”，它反映教学内容和非教学内容之间的边界（Bernstein, 1990/2003: 85），架构则决定着教育信息系统中教学的基本结构。分类和架构的强弱整体反映着社会控制的程度。在强势分类和架构下，学科内容之间彼此独立、边界明晰，教学内容结构稳定，选择单一。反之亦然。因此，语码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分类和架构之间的张力。据此，伯恩斯坦（Bernstein, 1996: 29）把教育语码的这一机制用符号的结构形式描写如下：

$$\frac{E}{\pm C^{i-e} / \pm F^{i-e}}$$

图2 语码的符号结构

公式中的 E 代表占主导地位的曲论语码取向 (elaborated orientation), +和-代表分类和架构的强度, i 指对内部关系的分类或者架构, e 指对外部关系的分类或者架构。随着 C 和 F 的强度变化,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教育实践模式。教育语码反映的是教育话语及其各种实践形式在社会建构中的潜在规则, 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知识系统如何成为人们意识的一部分, 从而揭示不同的教育话语模式所隐含的符号控制过程。伯恩斯坦根据分类和架构的强弱划分出两大类教育知识语码变体: 集合语码 (collection) 和整合语码 (integrated), 前者分类和架构强势, 后者相反。在此基础上, 伯恩斯坦划分出两种教育传递模式: 显性教育实践 (visible) 和隐性教育实践 (invisible)。教育语码对教育实践产生不同的规制力, 塑造不同的教育话语体系并创造出特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秩序。也即是说: “分类与架构根据不同的规则建立编码程序, 塑造心灵结构。但是, 特定的分类和架构背后是权力关系和基本的社会控制原则。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 分类和架构具现权力与控制, 因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并继而产生不同的交际形式。这些交际形式必定但不一定最终塑造心理结构。虽然权力维持分类 (也即物体间的隔离、边界, 无论是个体的内部关系亦或是外部联系), 它也可以通过不同程度的架构来实现。架构管控互动, 且经常处于在场……架构力度规制社会化的模态。” (Bernstein, 1975/2003: 10-11)

作为符号化的语码, 它所蕴含的符号权力体现在对范畴的分类上, 是一种范畴间的关系, 比如, 性别、群体、阶级、种族、概念等, 体现的是各范畴分类之间边界的强弱程度及合法性, 其目的是建立合理的关系秩序。语码的控制力用于维系不同范畴内合理的交际形式。因而可以说, 分类和架构为语码赋予了稳定的内部成分关系和符号结构, 借此, 权力和控制这两个社会学要素自然地进入教育知识话语体系, 语码完成了从语言语码到教育语码的转变, 同时具备了社会符号的基本特征。

四、语码的社会符号学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从语言语码到教育语码, 语码不断被抽象化、概念化、结构化并最终符号化。然而, 语码的符号化是以个体意识的物质性和集体意识的意向性为基础, 建立一个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语义系统之上, 因而也就避免落入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意义孤岛, 使其具备丰富的社会符号学价值和意义。如此一来, 伯恩斯坦语码理论的核心关怀可以归结为社会关系结构在符号交际中是如何被差异表征的。显然, 这里的差异不在于语言系统的区别, 也不是韩礼德语言学所说的语义潜势的不同, 而是不同社会关系在话语中的投射, 其本质为符号的中介功能。语码的这一社会符号学属性对于伯恩斯坦的整个社会学理论来说至关重要, 它直接开启了伯恩斯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对话与合作, 语言学和社会学以最自然、贴切、深入的方式走到了一起, 英国的社会学研究因而变得熠熠生辉,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

学也因获取了充分的社会学营养而光彩夺目（胡安奇、王清霞，2014）。对于此，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库尔玛斯（Coulmas，1975：5）曾评价道，尽管言语（speech）创造不同的群体，并在各个亚群成员之间起到中介调和（mediation）的作用，但是社会学理论却极少关注语言，哪怕是涂尔干（Durkheim），韦伯（Weber）和帕森斯（Parsons）也只不过是把语言作为社会的基本现实；即便是舒茨（Schütz，1965）从人种学研究的视角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亦或是哈贝马斯（Habermas，1985）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他们也只是从高度抽象的层面探寻社会交往得以可能的条件，唯有伯恩斯坦和格雷姆肖（Grimshaw）等极少数社会学家的研究是建立在现实言语材料之上，语言被赋予符号中介的社会建构功能。在这一点上，伯恩斯坦深受符号互动社会学家米德（Mead）和社会-文化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的影响，把话语方式同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语言成为调和思维、现实、文化的中介。诚如哈桑（Hasan，2005：150）所言，“语言的中介能力是语码理论的关键……尽管伯恩斯坦没有使用符号中介这个术语，但是符号中介的思想的确是他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伯恩斯坦的著述中，动词中介（mediate）出现了至少40次，尤其是在第一卷他对语言社会学的论述中出现频次高达25次。伯恩斯坦（Bernstein，1971/2003：19）认为：“词语在情感表达及其所认可的社会认同之间起到中介（mediate）作用，也就是说，价值观被赋予在情感的言语表达之中。它存在于所有社会，但关键的决定因素不一定在于词汇量的大小，而在于词语的性质和语言使用的类型，在于语言结构对思维和情感产生多大的中介效果。……语言的结构模式，也即词语与句子的关联方式，反映了情感结构的特定形式，继而反映出交往的途径和对环境作出的反应。”

伯恩斯坦因而借用历史-文化心理学中话语作为取向和规制系统的概念用于他的语码研究，进而把语言同意识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语码成为心理发展的社会之线上最光彩夺目的一环，因为“在所有符号形态中，唯有语言藐视时间，具备反思能力，为现实分类，解析可传达的经验，协同发出一个文化的不同声音”（Hasan，2005：134）。由此可见，语码并非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意义系统，是一个关系的系统网络，作为社会意义的符号实质上应该是一个包括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意义系统，社会性凸显的是符号意义的社会价值，关注的语言与社会结构二者作为社会系统的互动与共变关系。因而，韩礼德（Halliday，1978/2001：88）曾评价道：“伯恩斯坦的社会学是一个关于社会学习和文化传递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社会维持和社会变革的理论。”

至此可以看出，在伯恩斯坦的整个社会学体系中，语言就像圆心，把言语使用、权力与控制、文化传递、社会分工等要素组成一个社会学的圆。对于他的社会学思

想来说,语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因劳动分工带来的阶级差异引发的教育不平等,而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互相对立的研究模式,相反,语码理论成功地把语言、意识、社会这三大人类关切有机串联在一起,进而把教育问题跟家庭、学校、权力分布、社会阶层等紧密结合起来,从微观到宏观,将语言问题推向符号控制和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高度,使其具备广阔的应用空间,因而被广泛使用于教育话语分析及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五、结语

从言语使用到语码再到话语,伯恩斯坦试图把语言、传递、教学等微观过程同宏观形式结合起来,探究教育语码、教育内容与过程、文化传递如何跟社会阶级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一个系统的结构主义理论用于描述教育系统与社会分工的关系”(Sadovnik, 1991)。确切地说,伯恩斯坦最终是要建构一个涂尔干式的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劳动分工的改变如何创造不同的意义系统和语码系统以及这些系统如何分类,并把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同结构主义路径整合在一起。从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语码不仅仅是一套言语交际的规制原则,它还是“教育实践信息系统的规制原则”(Atkinson, 1985: 136),发挥着符号中介的功能,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实现社会关系的控制和调节功能。正是通过语码这一社会符号属性的概念,伯恩斯坦搭建了一座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对话与沟通的桥梁,为我们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途径。

注释:

- ① Logonomic 是 logonomos 的派生形式,是 Hodge 和 Kress 自创的一个合成词,由 logos 和 nomos 构成。希腊词 logos 就是文中提到的逻各斯,含有规则、思想、语言等意义, nomos 是指控制机制 (a control or ordering mechanism) (Hodge & Kress, 1988: 4)。

参考文献:

- [1] Atkinson, P. 1985. *Language, St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of Basil Bernstein*[M]. London: Methuen.
- [2] Benveniste, E. 1966/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3] Bernstein, B. 1971/2003.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I):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C]. London: Routledge.
- [4] Bernstein, B. 1975/2003.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III):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C]. London: Routledge.
- [5] Bernstein, B. 1990/2003.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IV):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 Discourse*[C]. London: Routledge.
- [6] Bernstein, B. 1996.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C].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7]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8] Coulmas, F. 1975.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9] Habermas, J. 1985.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 New York: Beacon Press.
- [10] Halliday, M. 1975/2007.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Semantic Change[A]. In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Society*[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11] Halliday, M. 1978/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12] Halliday, M. 2003. On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Language[A]. In J. Webster (eds.)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III):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 London: Continuum.
- [13] Hasan, R. 2005. Semiotic Mediation and Three Exotropic Theories: Vygotsky, Halliday and Bernstein[A]. In J. Webster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C]. London: Equinox.
- [14] Hasan, R. 2009. Language in the Processes of Socialization: Home and School[A]. In J. Webster (eds.) *Semantics Variation: Meaning in Society and Sociolinguistics*[C]. London: Equinox.
- [15] Hodge, R. & G. Kress. 1979/1993. *Language as Ideology*[M]. London: Routledge.
- [16]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7] Sadovnik, A. 1991. Basil Bernstein’s Theory of Pedagogic Practice: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 48-63.
- [18] Schütz, A. 1965.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 van Leeuwen,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M]. London: Routledge.
- [20] Volosinov, V.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1] 丁建新. 2016. 作为文化的语法-功能语言学的人类学解释[J]. *现代外语*, (4): 459-469.
- [22] 胡安奇, 王清霞. 2014. 伯恩斯坦语码理论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途径述评: 以韩礼德和哈桑的研究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26-31.
- [23] 胡安奇, 曾蕾. 201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研究[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56-59.
- [24] 胡壮麟. 1994. 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49-57.
- [25] 田海龙. 2015.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6): 1-7.